

数字加速器：亚洲的政府治理不断加速

作者：Vitor Gaspar 和李昌镛

2018年9月26日



马来西亚打车服务科技创业公司 Grab 的一名司机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搭载一名乘客：数字化正在改变亚洲的企业和政府（Afif C. Kusuma/iStock）

亚洲的数字革命丝毫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从电子商务巨头（例如，中国的阿里巴巴、日本的乐天），到打车服务和数字支付科技创业公司（例如，印度尼西亚的 Go-Jek、印度的 Paytm），再到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广泛运用，数字化正在改变亚洲地区企业运营的方式。

数字化同时也在改变政府运作的方式。由于数字化的出现，政策制定者得以通过更多渠道及时获取准确数据。政府掌握了更好的信息，就能够制定和执行更好的政策，例如提高税收合规性和政府支出效率等。

事实上，亚洲各国政府将数字技术用于公共财政管理之举正在直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然而，要想充分获取数字红利，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多个方面采取全面政策行动。

电子政务带来的惠益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数字化能够使政府更加公平和高效。印度在 *Aadhaar*（世界最大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为印度 12 亿居民提供了一套独有的 12 位身份号码）方面的[经验](#)很好地说明了问题。

这一识别系统与各种社会计划（包括液化石油气补贴计划）相关联。2013 年，印度政府将 *Aadhaar* 受益人号码与液化石油气计划挂钩，从而帮助避免了“幽灵”受益人的权利主张或双重权利主张。除此以外，印度政府还将补贴款项直接转至与 *Aadhaar* 关联的银行账户，此举绕开了经销商，加大了对穷人的支持力度。

另外，菲律宾将数字登记表——*Listahanan* 作为多达 52 项的社会计划（从现金支付转移到紧急援助）的门户，已登记人口占总人口的 75%。印度尼西亚的数字社会登记表似乎还帮助扩大了有条件现金支付转移计划的覆盖范围。

甚至是在数字化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国家，各种举措也在不断推出。数字化可以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例如，[孟加拉国](#)使用智能水表进行水质监测。数字举措还有助于公共财政管理——例如，[不丹](#)的电子工具帮助实现了公共投资项目评估和选择的标准化。

数字化带来的惠益不仅体现在支出方面。在财政收入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普遍将电子报税、电子缴税和电子通关举措用于税收征管，这些举措正在产生效用。在[马来西亚](#)，目前电子报税和电子缴税方面的工作已经将合规时间缩短了 30%。

实现数字化的挑战

这些数字举措在为各国政府带来巨大惠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应对行动刻不容缓。

首先，亚洲地区数字技术的普及度和必要性意味着有更多人面临着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黑客利用自身的数字技能盗取私人信息，破坏政府职能。对于诈骗犯来说，数字世界（包括[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是一个下手目标众多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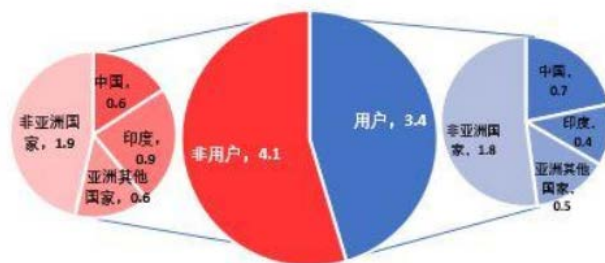
其次，一般而言，经济的数字化可能会减少税收收入。例如，旅游者可以通过数字平台住进私人住宅中，而不是入住需要缴税的酒店。这些小企业交易可能低于税收门槛，从而导致政府财政收入损失。数字经济还会为逃税者将利润转移至海外、撤离税收部门的管辖范围提供便利。

第三，在无法访问互联网的人口中，半数以上生活在亚洲。虽然亚洲地区宽带用户数量已经增长，但是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例如，缅甸居民中拥有固定宽带网络的人数不足 1%，而新加坡的人数则超过了 25%。电子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们能够访问电子政府。

拓宽渠道

在全球无法访问互联网的人口中，半数以上生活在亚洲。

(能/不能访问互联网的人数；十亿；最新可得数据)



来源：世界银行和世界发展指标 (WDI)。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最后，一些国家实现了跃进，而另一些国家则远远落后。韩国、新加坡、日本和马来西亚位居世界十大数字政府行列。印度超越了发达经济体，而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则超越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与此同时，小型岛屿国家和脆弱国家为在电子政府领域取得重大进步而艰难前行。缅甸、图瓦卢和马绍尔群岛的数字化水平仍然有待提升。目前，亚洲地区数字化的应用种类多样且影响深远，由此可见实现这种提升具有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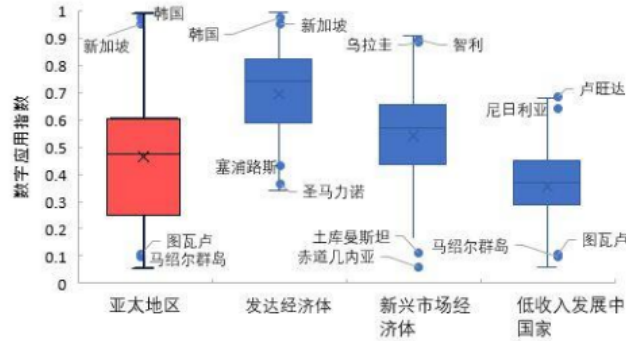
克服数字障碍需要改变方法

恰当的政策有助于各国政府防止欺诈和网络攻击以及增进数字化惠益，这不啻为一个好消息。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已经建立了负责监督网络安全战略和运行的机构。

实现数字化

因收入水平不同，亚洲各国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改善公共服务之举大相径庭。

(政府数字应用指数；最新可用年份)



来源：世界银行和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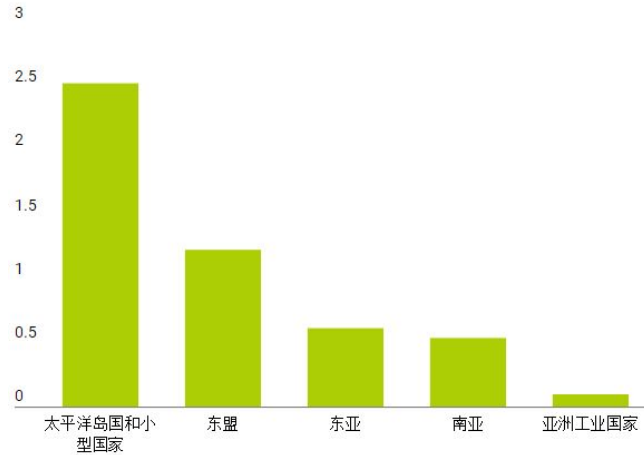
各国政府还应当始终保持警惕，并对本国财政收入予以保护。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对数字化影响财政收入的领域进行监测。例如，如果数字化将某些服务转移到低于税收门槛的较小企业，那么政府可以选择重新审议当前的门槛水平并作出修改，从而能够对类似活动征税。

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还能方便各国政府收集关于金融交易的数据，由此改进征税工作，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发展和新兴经济体尤其如此，具体而言，缩短与数字化前沿国家之间的一半距离可以为东盟经济体带来占GDP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值税收入。

电子政策

东南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实施了更多政府监督，此举可大幅提高增值税收入。

（缩短与数字化前沿国家之间一半的距离估计提高的增值税收入；2016年；占GDP的百分比）



来源：基金组织2018年春季《财政监测报告》和工作人员的计算。



对于那些国民无法可靠使用互联网的国家而言，应当促进开展数字基础设施（例如，宽带技术）方面的早期投资，以确保包容性并获取数字化带来的惠益。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需要建立财政制度以管理各项政策的制定、规划、预算编制和实施。

在此类政策的引导下，亚洲各经济体将继续推动数字革命向前发展，继续为其自身、也为全球其他政府创新者开疆拓土。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任葡萄牙财政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中央银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李昌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李昌镛博士曾任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他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与发展趋势问题的首席发言人，并负责经济与研究部的管理工作。李昌镛博士曾担任二十国集团韩国峰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在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任职之前，李昌镛博士是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他经常积极为韩国政府（包括总统办公室、财政经济部、韩国央行、韩国证券集中托管公司和韩国发展研究所）提供政策建议。李昌镛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以及韩国经济，并在上述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李昌镛博士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